

# 新时代驾驭资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郑尚植<sup>1</sup>, 刘奕成<sup>2</sup>

(1. 东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2. 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地,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资本作用的二重性使得实现对资本的科学驾驭成为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健康发展的题中之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对的形势也历经了深刻的变革。研究发现, 马克思对资本的隐喻内含了资本从出场、在场到退场的辩证逻辑, 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中把握资本从何出场、依何在场、因何退场的逻辑脉络是在新时代实现对资本科学驾驭的理论底色; 当下资本无序扩张在生产关系中生产环节、分配环节、交换环节和消费环节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这些问题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的消解影响成为当下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障碍, 同时也是完善对资本的驾驭体系构建的现实张力。研究表明, 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有效作用能够将资本无序扩张的破坏性影响消解, 应通过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制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 搭建以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为框架的中国特色治资之路。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驾驭资本;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 资本批判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24)03-0001-16

## A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alysis of control of capital in the new era

ZHENG Shangzhi<sup>1</sup>, LIU Yicheng<sup>2</sup>

(1. School of Marxism,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Liaoning, China; 2. Research Base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role of capital necessitates its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rimary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evolved, leading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Marx's metaphor of capital encapsulates the dialectical progression of capital from its emergence to its dissolution. Understanding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where capital appears, on what basis, and why it exists, as derived from Marx's critical theory of capital, form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scientific control of capital in the new era. The unchecked expansion of capital has created numerous new issues across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within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se issues are undermining the socialist economic foundation, posing significant obstacles to resolving curr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esenting a practical challenge for improving the capital control system.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due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ffective influence of the socialist superstructure o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can mitigate the destructive impacts of unregulated capital expansion. By leveraging the Party's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over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regulation of the socialist legal system, and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t ideology, a uniquely Chinese model of capital govern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chored i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superstructures.

**Key word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trol of capital; production relations; superstructure; capital criticism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将资本引入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创举,但资本无序扩张的天性又注定其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必须认识到,资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就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sup>[1]</sup>。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资本运行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水平,满足了人民的需要,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而资本运行所带来的负效应也成为当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根源,制约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实现。这就使得我们需要基于新的历史条件“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sup>[2]</sup>。在利用资本创造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有利条件的同时,应消解资本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实现对资本的科学驾驭。为此,党中央作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sup>[3]</sup>等科学决策,为探索如何驾驭资本的命题提供了理论方针。

近年来,驾驭资本这一重大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众多学者从多维立体的视角出发展开了激烈讨论。从分析资本范畴出发,叶险明在剖析资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科学看待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成果,实现从驾驭“资本逻辑”到超

越“资本逻辑”<sup>[4]</sup>;邱海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制约下的资本能够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被正确引导和规范,其破坏性作用也可以被有效遏制<sup>[5]</sup>;张旭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然孕育出新生的、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的社会关系<sup>[6]</sup>。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林炎志以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的“二元三层结构”让中国共产党实现对资本驾驭的内在机理<sup>[7]</sup>;唐爱军认为驾驭资本就是驾驭资本的扩张本性,提出从为资本划界、引导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实现对资本的驾驭<sup>[8]</sup>。从驾驭资本的实践路径出发,秦慧源提出了构建客体层面上的“立体驾驭机制”和主体层面上的“综合驾驭机制”,以文化建制、法律建制和政治引领实现对资本逻辑的驾驭<sup>[9]</sup>;荣兆梓主张从微观、宏观两个层次上充分利用“场与结构的耦合效应”,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驾驭<sup>[10]</sup>;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研究出发,胡博成等主张社会主义建设围绕“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形成了扬弃资本逻辑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sup>[11]</sup>;邢荣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劳动逻辑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sup>[12]</sup>。上述理论成果为中国驾驭资本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对新时代资本运行呈现出的新特性、产生的新影响的分析缺乏针对性,对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资本无序扩张产生的阻碍作用研究有待深化,对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规制资本的体系构建有待完善。

基于此,本文针对新时代科学驾驭资本

的现实张力与实践路径进行反思与重构,旨在破解附着在资本身上的新迷雾,为实现在新时代对资本保持扎实有力的驾驭能力提供思考和建议。首先,本文尝试在马克思对资本范畴的诸多隐喻中捕捉资本运行的辩证逻辑,为分析新时代背景下资本幻化的新角色铺垫理论底色;其次,本文通过分析资本无序扩张经由生产关系4个环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解性影响,剖析驾驭资本的主要矛盾和现实张力;最后,本文试以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路径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资本的约束框架,以此展望新时代驾驭资本的新路向。

## 一、新时代驾驭资本的理论 底色:把握马克思资本 范畴的辩证逻辑

资本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在新时代探讨如何驾驭资本就要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诚如德里达所言:“马克思在一种本体论中建立他的对幽灵的幻影的批判或驱魔术。”<sup>[13]</sup>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诸多著作中以一系列带有诗性色彩的隐喻为世人勾画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图景。这些隐喻将资本的本质以艺术化的形式表达,同时使资本运行的逻辑在历史的舞台上生动呈现。通过这些隐喻,我们不仅可以深刻感受马克思思想中感性与理性相激荡的火花,同时能从中洞悉资本从何出场、依何在场、因

何退场的逻辑脉络,更好地在新时代把握资本的角色,提升对资本的理解和驾驭能力。

### (一)从化蛹、蝶变到吸血鬼:资本出场的叙事逻辑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14]</sup>为向世人描绘资本的前世今生,揭示资本充斥着血腥与污秽的本质,马克思欲抑先扬,在资本论的开篇先以虫羽化成蝶的过程隐喻资本的诞生,后用“吸血鬼”隐喻让资本褪去了“蝴蝶”美丽的魅影,揭露了资本人格化的恐怖本质,为世人呈现了雇佣劳动制下资本利用“死劳动”的獠牙,无休止地吮吸工人的活劳动的现世图景,完成了对资本出场的叙事。

虫羽化成蝶是在自然界中代表新生的美妙蜕变。在马克思眼中,商品是“幼虫”,货币是“虫蛹”,资本的诞生就是商品“化蛹”再到货币“化蝶”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前资本主义时代存在的简单商品交换无法满足社会急剧扩大化的交换需求,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简单商品不得不“蛹化”为货币,完成一次“惊险的跳跃”,以实现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通约,建立起沟通二者的桥梁。于是,商品“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sup>[14]</sup>。在自我增殖本性的驱使下,货币必须完成向资本“蝴蝶”的“羽化”。实现这一过程的关键就在于对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购买。当劳动力成为商品后,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实现了从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跨越,由“为买而卖”流通手段转换为

“为卖而买”的增殖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通过货币掩盖了劳动力价值与劳动价值之间的差异,让由G到G'飞跃暗藏着“消失”的剩余价值的秘密。货币化身资本实现了它自我增殖的使命,也就此制定了雇佣劳动力进而无偿占有剩余劳动这种“理所应当”的资本主义法则,埋藏下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种子。

马克思通过“吸血鬼”隐喻将资本“化蛹成蝶”的温情面纱祛魅,揭露了资本的血腥本质。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sup>[15]</sup>这一观点包含两重意蕴:一是对不同性质的劳动和资本的划分,二是对资本作为一种权力,或者说一种关系的解读。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sup>[14]</sup>从事着“活劳动”的工人不仅转移着作为“死劳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同时无知觉地进行着无酬劳动,因此资本增殖的真正源泉在于作为可变资本的工人和其所进行的无酬劳动。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sup>[16]</sup>。马克思利用“吸血鬼”的隐喻想表达的更重要的是如同“吸血鬼”与人类的关系一样的资本与劳动者的关系。这种关系下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却被资本反噬受其支配,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不断再生产着这种支配关系。只要资本存在,它就要不断吮吸“活劳动”,榨取剩余价值,工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sup>[14]</sup>。

## (二)化身“普世的光”的魔法师: 资本在场的合法性逻辑

马克思眼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一个“魔法师”,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sup>[17]</sup>,塑造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sup>[18]</sup>。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化身“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sup>[19]</sup>。这样的隐喻一方面揭示了资本物化一切魔法,道出了资本“魔鬼”的本质;另一方面也高度肯定了资本的积极作用,成为资本在场的合法性证明。

资本主义制度的文明性在于它“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sup>[18]</sup>。传统社会中,自然经济束缚着人的力量,而货币的出现让“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sup>[17]</sup>。挥舞着这柄由货币打造的“魔杖”,资本得以让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将蕴藏在人类劳动中的巨大生产力激发,实现了人对自然力量统治的颠覆。在资本增殖扩张欲望的驱使下,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催生了工业革命。自此,机器大工业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生产工具和要素周转速度的限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20]</sup>。由资本打造的“庞大的机械怪物”迅速推动生产和市场的全球

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将现代性引入人类文明,开辟了世界历史空前辉煌的新高度。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20]</sup>资产阶级的丧钟早在马克思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鸣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已诞生并落地生根,可是资本主义在当代仍然焕发勃勃生机。虚拟经济、互联网商业为资本“蝴蝶”开辟了新的花园,使其魅影不减反增。福利制度、“中产阶级”化让资本家不再是带着獠牙的“吸血鬼”,而成为让工人麻痹的“蚂蟥”。“机械怪物”疯狂旋转带来的资本主义过度积累危机经时间推迟和空间转移实现了“时空修复”<sup>[21]</sup>。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是不可摧毁的神话,反而印证了资本主义式微、谋求妥协的趋势。当下,我们不仅不急于追求资本的退场,反而要让资本持续在场,充分利用资本未能全部发挥的“余温”,让资本的“魔法”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打造的戒律下发挥作用,为发展生产力、造福于民服务。

### (三) 掘墓人与行刑者:资本退场的历史逻辑

以唯物史观来看,资本的退场同资本的在场都是历史发展的应有之义。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sup>[20]</sup>。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将“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

掉。”<sup>[20]</sup>资产阶级终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而无产阶级将成为终结资本的“行刑者”。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飞跃,而是遵循着社会发展逻辑的历史变迁。

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看到了资本增殖的真正逻辑,因此识破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理解的资本主义“魔法”。他尖锐地指出:“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sup>[20]</sup>运用“魔法”的“魔法师”最终会被“魔鬼”所吞噬,昭示了资本主义的宿命。在“魔法”的作用下,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高度“物化”的世界,它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降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无法主宰自身而受抽象的统治。这种统治“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sup>[20]</sup>。其结果就是资本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将生产力的真正源泉——劳动者禁锢并异化,在为其增殖扩张开辟场域的同时将这场域内的大多数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在创造丰硕文明成果的同时让小部分人奴役大部分人的程度和形式达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巅峰。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在如此矛盾的发展基础上,纵使现代资本主义演化出多么灵活自我调整能力也不过是强弩之末,资本的一切文明性终将被消耗殆尽。

“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

了。”<sup>[14]</sup>当生产力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冲突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也无法调和或转移时,资本主义连同创造它的资本将从历史舞台中退场。这一历史使命肩负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就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必须将作为“锁链”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全部砸碎,才能获得解放。资本主义“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sup>[20]</sup>。无产阶级只有认识到阶级对立的本质,看穿资本“魔法”所物化的世界中被遮蔽的社会关系,消除资本专制下的阶级压迫和虚假意识形态控制,建立真正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才能破除“普照的光”与“特殊的以太”在人间的统治,实现对“魔法”的驱逐和对“吸血鬼”的绞杀。

## 二、新时代驾驭资本的现实张力: 资本无序扩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解

马克思将社会比喻为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组合而成的大厦,其中经济基础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特色就在于将资本与资本主义解绑,让资本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摄下为发展生产力服务。但资本无序扩张的天性使得其存在着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天然的矛盾,在其运动过程中以构成生产关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4个环节传导路径,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产生消解影响的同时成为当下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

突出障碍,也形成了在新时代对资本实现科学驾驭的现实张力。因此,把握资本无序扩张在生产关系4个环节中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的具体样态和形成原因是实现对资本科学驾驭的重要前提。

### (一)生产环节:脱实向虚加剧

生产环节与供给侧直接联系,而供给侧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在新时代,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经济“脱实向虚”问题已成为中国供给侧出现的突出问题。资本在虚拟经济中获利无需经过实体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过程,而以特有的运动规律形成独立的“以钱生钱”循环体系。这里所说的第一个“钱”本身所代表的只是“对现实中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sup>[22]</sup>,即虚拟资本,其并不会在真正意义上创造第二个“钱”,即财富。虚拟的“钱”在其循环中表现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实际上是对实体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实现再分配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资本“脱实向虚”不仅不能从根本上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会瓜分蚕食真正实现财富创造的生产制造业的生命力。在虚拟经济的原生市场中,虚拟资本与产业资本尚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新生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标准化合约交易使得资本运行彻底脱离了实体经济这个“底座”,极大消减了资本扩张的“摩擦力”,杠杆机制的引入又为资本扩张增添了“加速器”。随着实体经济出现的产能过剩、要素成本上升(自然资源、劳动力)、融资困难等问题,创造利润的能力受到影响,资本在

实体经济中获利的空间有限。反观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具有更高的利润率、更低的准入门槛以及相对滞后的法律监管体系,越来越多的资本倾向投入其中。这就使得大量资本绕过产业资本的束缚进入虚拟经济领域运行,不再投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生产循环上的“断层”,制约了经济良性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使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逐步显现,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整体循环不畅。”<sup>[23]</sup>“脱实向虚”带来多样化的消极影响,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在虚拟经济中消除了运行“摩擦力”的资本具有更强大的“以太效应”,资本的集中化趋势更加明显,垄断的程度提高且覆盖面更广,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的程度。其二,虚拟经济的投机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资本创造虚假繁荣的景象,释放错误的经济信号,导致生产能力与消费水平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促使经济周期性波动更为频繁和剧烈地出现。其三,虚拟经济使实体经济愈发羸弱,资本在重点领域与关键产业的缺位使得对核心技术、“卡脖子”项目的突破缺乏动力,对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高质量供给体系、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形成阻碍。不仅如此,虚拟经济将社会主义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相勾连,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金融体系将社会主义市场纳入其统摄之中,成为在全球范围内剥削剩余价值、转嫁经济风险的对象。由此观之,“脱实向虚”问题不仅是制约工业化后期发展战略实施的突出瓶颈,还是危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消极因素。

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具有因果关系,成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阻碍。

## (二)分配环节:劳资收入失衡

从“吸血鬼”隐喻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是雇佣劳动关系中分配问题的主要矛盾。在新时代,雇佣劳动关系依然存在。因此劳资矛盾仍可以作为分析资本无序扩张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分配环节消解作用的切入点。改革开放初期,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目标指引下产生了大量的资本缺口,同时农村包干制度以及城市国企改革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二者共同奠定了在资本的稀缺性和劳动力资源的富余性基础上形成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而在新时代,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得益于资本以更短的时间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扩张,资本报酬在分配中的竞争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固化了“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同时,生产环节所产生的“脱实向虚”现象也渗透到分配中。国内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发展并逐渐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在此基础上,国家有保证本国资本账户充足的要求,市场有刺激经济主体活力的需要,企业对融资以及资本偏向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追求都使得资本越来越成为要素报酬分配中优先考虑的对象。网络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的共享分配方式让劳动者看似能更加自由灵活地进行劳动和参与到分配过程中,实际上是将原本空闲的非生产性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为资本家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凭借技术创新化身为吸附于新业



态的“蚂蟥”,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有劳动剩余价值,从其本质上讲,仍然是分配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的挤占侵蚀。

在“资强劳弱”的格局之上,资本无序扩张不断扭曲着要素分配比例,其带来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劳资收入失衡、劳资矛盾激化,直接制约着发展的平衡性。高度发达的资本要素市场中资本以其强竞争性与集中性打破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使垄断现象较为突出。相对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要素在市场机制下的自由流通,使得劳动力无法在市场中取得公平的报酬,造成了区域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资本投资回收周期短、投资回报率高以及具有政策扶持的优势,使得无论是作为推进工业化目标主力军的国有企业,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逐步形成的私营企业以及引入的外资企业对资本的需求程度、投资意愿都远高于劳动力;地方政府在“晋升 GDP 锦标赛”<sup>[24]</sup>的发展模式下容易滋生寻租与腐败。在各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资本在分配中不断挤占劳动、利润,不断挤占工资,劳动报酬处于劣势地位。广大劳动者是人民群众的主体,但保障其在生产生活中根本利益的按劳分配制度不断受到资本无序扩张的破坏,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消解影响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阻碍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 (三) 交换环节:平台经济垄断

马克思认为交换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sup>[25]</sup>。这表明交换不仅是生产关系中的一

环,还具有生产力的性质。一方面,交换处在生产关系的枢纽位置,将生产与消费衔接起来,作为联系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纽带存在;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中交换环节承担着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交换效率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将直接对商品生产、分配、消费环节的进行乃至生产力发展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起决定性作用,商品实现了跨行业、跨区域的高效交换。资本在交换环节的良性扩张为市场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同时资本在交换环节中无序扩张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日益凸显。当下,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互联网大数据的普及以及现代信息体系推广背景下诞生的平台经济为商品的交换环节开辟了新的维度。平台中的资本扩张虽然不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但由于平台掌控着现代市场中沟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基础设施与体制机制,使得平台中资本扩张的行为在整合信息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换效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资本也会在平台中的无序扩张形成的垄断与恶性竞争成为牵制供给侧、误导需求侧的破坏性因素。

平台经济脱生于互联网科技,天然打破了传统商业模式在时间、空间、效率和规模上的限制,使得平台经济中的垄断现象在覆盖范围、影响程度上都远比传统商业模式下的垄断现象严重。中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于 2022 年突破 40%,如此庞大的平台经济规模下,个别平台企业为争夺垄断地位、建立垄断优势开展了一系列恶性竞争行为。部分先形成的平台企业利用巨额资本注入、技术创新、政策红利等优势条件获得

垄断地位。然而“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sup>[17]</sup>。在阶段垄断格局形成后,后发形成的平台企业必然谋求垄断格局洗牌。在这一过程中原处于优势地位的个别企业为维护自己的竞争优势,采取“二选一”“大数据杀熟”“掐尖并购”等诸多恶性竞争手段;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平台企业通过补贴换市场、流量造风口的方式,利用资本扩大自身的市场份额在垄断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恶性竞争的情境下,市场秩序被扰乱,经济运行质量被破坏。消费者与平台企业之间交换商品与服务表现出的等价形式,实际上隐含了平台企业无偿占有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提供的商品、劳动的附加值而形成“不等价”的剥削。生产者与消费者作为平台经济的上下游看似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与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实则可能被裹挟于资本无序扩张的浪潮之中。平台垄断的形成让平台经济实现了对生产关系的“倒置”,以商品的交换引导消费、牵制生产,形成了交换环节对其他生产过程的统驭。换句话说,资本在交换环节的无序扩张阻碍着需求侧牵引供给侧提质增效作用的发挥,让两大部类生产的动态平衡成为资本控制下表面化的平衡,那么也就无法真实地将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相耦合,在动态发展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

#### (四) 消费环节:互联网商业乱象

在新时代,一方面,资本运行能够刺激需求侧结构升级,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资本在消费环节的无序扩张通过借贷消费模式给予消费者扩大化的消

费能力,又以文化和技术隐性控制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由此将消费者置入由资本逻辑所打造的消费牢笼之中,对生产关系又一环节产生消解作用。互联网商业模式中便捷的金融服务扩大了消费者当期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分期付款、多平台贷款的功能化解了消费者过度消费后支付能力不足的压力,让普通消费者实现了从原来按照现有支付能力进行消费到如今利用广泛的数字金融平台进行借贷消费的跨越。在数字金融平台与电子商务平台的结合下(如淘宝与蚂蚁金服、京东与京东金融),资本既控制了商品消费的对象,又控制了商品消费的经济来源。消费者进行消费、购买商品的行为使资本能够获利,消费者为了消费而采取的借贷行为使资本能够通过金融服务所产生的中介费与交易费再次获利。通过这样的方式,商业平台给予消费者逐步扩大的支付能力,又利用其预支的消费能力维持消费的持续性以实现无限的增殖。消费者的储蓄被逐渐掠夺,消费能力被逐渐透支,可能落入借贷消费的陷阱之中。

资本为实现增殖会创造相应的文化环境为其提供新的扩张空间,在泛娱乐化成为普遍现象的背景下,资本与文娱产业的结合催生了粉丝经济、网红经济等新消费业态。资本在电视、新闻、社交软件等媒体频繁造星的过程中为其扩张开辟了一个新的场域——粉丝群体。这个建立在对网红、偶像的狂热崇拜所构建场域内,资本利用“偶像”的影响力为商品“背书”,引导粉丝群体的消费行为。粉丝通过消费与偶像、网红相关产品来进行情感表达、寻求价值认同,由此催生出在“明

星同款”“网红种草”影响下的一波波消费热潮。更甚的是,资本利用粉丝经济获利在当下越来越趋向“去实体化”。在抖音、快手等自媒体平台上,粉丝为获得偶像网红的关注和直播间内华丽的特效在虚拟礼物打赏上进行巨额消费,一场网红直播甚至能产生数以千万计的现金流水。这种资本支配下偶像效应所带来的消费往往盲目过度、奢靡攀比,带来巨大浪费。

当下,“数据当道、流量为王”的观念逐渐被商业体系奉为主臬。谁掌握了数据,谁就能够破解“流量密码”,谁就能实现对消费市场的主宰。于是,资本操控下的商业平台、运营公司以消费者在互联网活动中所留下的海量数字痕迹为依托,凭借不断精进的数据处理和智能算法分析技术实现了对消费者消费能力、消费习惯、消费倾向的精准定格。这种现象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人性化、便利化的服务,实则掩盖了资本对消费者的宰制。一方面,消费者的真实需求逐渐被精准“人性化”的信息推送所麻痹,商业平台服务于消费者需求而提供的智能推荐隐含了对消费者消费倾向的延伸引导,让消费者在这种人性化所带来的舒适感上瘾,进而购买许多原本不需要的商品;另一方面,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信息成为新的商品,这种数据商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且在数据商品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新的利润完全与创造它的消费者相脱离。传统商业模式下消费者是“上帝”,而在现代互联网商业模式中资本实现了对“上帝”的奴役。

### 三、新时代驾驭资本的路径探索： 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的有效约束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逻辑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贯穿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资本逻辑的统驭下,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社会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更不用谈“驾驭资本”的命题。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了“有异于传统唯物论的‘双范畴’现象,即上层建筑应该包含在生产关系之内,生产关系既可以与生产力结合构成经济基础,也可与法律、意识形态等结合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上层建筑”<sup>[7]</sup>。这也就意味着,得益于上层建筑的中国特色,上文所述的资本无序扩张经由生产关系4个环节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破坏性影响可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有效约束下消解。对资本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化解资本无序扩张产生的风险与阻碍,实现资本有序化,让资本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约束力下良性运行。

#### (一)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资本约束框架最重要的一环,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资本的运行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

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人民立场充分融入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全过程,在资本运行的每一环节都牢牢抓紧其“缰绳”,让资本运作始终向有利于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形成区别于以“资本”为轴线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以“人民”为轴线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资本的过程中党的领导力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始终在场,将资本限制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下,这也就保证了社会前进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偏移。在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始终能够拥有长远的规划与全面的安排。在纵向上,百年目标与五年计划实现了中长期规划的结合;在横向上,“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兼顾了宏观治理的结构、稳定等多重目标。这就消除了资本扩张的颠覆性影响,构建起多层次、多样化、多阶段规制资本的框架。

为发挥资本的有利作用,党坚持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于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运作规律与特性上。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引导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良性运行。面对不同类型的资本,党采取了适合其发展的不同对待方式。在国有资本中加强党的领导力,使国有资本能够高效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影响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发挥其统帅作用。在私有资本中提高党的参与度,发挥其在促进资源流动、推动科技创新、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的作用。面对“脱实向虚”的问题,党提出“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防止脱实向虚”<sup>[26]</sup>。

发挥资本在虚拟经济中运行带来的刺激作用的同时让资本为实体经济发展贡献力量,促进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发展。为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消极影响,党提出了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全面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等一系列指导思想。为解决资本扩张带来的劳资矛盾,党提出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举措,着力保障劳动者权益,让劳动者能够公平地参与到社会竞争中来。针对资本扩张产生的垄断现象,党和政府制定一系列反垄断政策,加强市场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坚决打击一切利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低价购买、高价销售、差别待遇的行为。为化解消费不足及资本对消费者的宰制问题,党提出“提信心扩内需促消费”。通过改善消费条件、扩大高质量供给、开辟消费新业态等方式,增强消费者信心,提高消费者消费能力,并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消费者权益不被资本扩张所侵害。

## (二)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制

资本自身是作为一种经济权利存在,但在增殖逐利的本性驱使下,如不加约束就将越轨于经济而向政治、文化等领域蔓延,在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外部性。因此,驾驭资本就要为资本划轨,防止资本越轨,将其置入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打造的“制度的笼子”里。为资本划轨,就是明确资本的运作边界,将资本限定于经济领域。那么就客观要求我们将作为经济领域主体的市场打造为一片净土。其一,坚决维护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sup>[27]</sup>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巩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维护好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的参与权利才能更大程度上让资本有引导有方向的运行,同时不损害资本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充分调动资本的积极性。其二,要完善市场法律法规,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破除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壁垒,改革不利于资本发挥其灵活性、高效性的体制机制,为资本健康发展营造更加清朗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其三,协调劳动与资本报酬比例,保护劳动者权利。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让从事新兴业态的劳动者公平地参与到分配中,保护其权益不受资本的侵蚀。以法促治,在健全劳动法与市场法的持续发力中,让各类社会资本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同时限制其对劳动的挤占,使社会整体朝向劳资和谐的方向发展。

完善对资本运行的经济领域建设的同时还要以法律构建资本运行的“红绿灯”,防范资本的越轨行为。对在经济领域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健康发展的资本绿灯放行,对向非经济领域蔓延或会产生负外部性的恶性扩张严令禁止。以法律将资本的运行约束于发展生产力的物的逻辑,避免其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凌驾于人的逻辑之上,在非经济领域以法律构筑资本运行的藩篱。其一,严厉打击资本侵蚀权力的“设租”“寻

租”行为。杜绝权钱交易、贪污腐败等问题就是要以法律切断资本勾连行政、司法的利益渠道,弥补法律体制漏洞,增强法治效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打造政治素养过硬的干部队伍,时刻警惕资本侵蚀,以法律促进政府自身反腐清淤,恪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无孔不入的资本无孔可入。其二,在资本会带来市场负外部性的领域加强法律体系建设。在文化领域加强对文化产业的监管审查,防范资本侵蚀带来的功利主义、机会主义等不正之风,加强维护意识形态警惕性。在生态领域完善生态立法,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在生态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蔓延。其三,垄断的形成必然导致资本向非经济领域的扩张,因此必须强化市场监管与反垄断规制,对生产力发展中不断产生的新的垄断组织和新的垄断行为作出及时的反应,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完善反垄断的法律法规。由此,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运行的资本被规范了方向性,遏制了破坏性,相较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放任资本发展更具优越性。

### (三)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

在由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构筑的政治上层建筑对资本的有效约束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以观念上层建筑进一步加强对资本运行的引导,同样不可或缺。

第一,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古往今来,对资本的研究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学说体系。但从对资本本质剖析和对资本运动规律以及

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洞察等诸多角度来看,没有哪一种学说对资本的研究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富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的创举。恰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本质的深刻剖析给予了订立这一目标的理论根基,对资本运行规律的生动演绎提供了走向这一目标的方法策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充分论证赋予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信心和路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并不能墨守成规,而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境遇的双重考察下落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实践中,开辟坚实且灵活的治资之路。

第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融入市场经济主体的观念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并追捧一套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但如今资本无序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上诸多问题让西方民众逐步看穿资产阶级统治的虚伪面纱。与之不同,我们将“人民至上”作为驾驭资本逻辑的价值尺度,以人民利益作为利用资本、限制资本的价值遵循。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嵌入到资本运行的每一环节,实现对资本扩张逐利本性的约束,让资本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指向运行。在此意义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让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体以更为长远和全面的目标制定发展战略,摆脱资本主义市场中企业“唯利润论”的窠臼,增强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让个人主体的行为与观念从资

本支配下对财富的贪婪欲念进行“投机倒把”转变为追求提升自身科学文化修养和劳动技能,通过踏实勤劳而致富。由此实现市场主体与资本“共舞”,而不是被资本所异化宰制,形成资本与市场经济相辅相成、发展为民的良性循环。

第三,要将驾驭资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sup>[23]</sup>当下,在资本无序扩张浪潮裹挟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社会撕裂、精神贫乏、信仰危机等问题,这同样是中国在驾驭资本的过程中会面对且必须处理好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所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大同”“调均贫富”“义利荣辱”等诸多思想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能为驾驭资本的实践提供传统智慧和深层次动力。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能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从单纯满足增殖扩张的本性中解脱出来,转而为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推动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从这个角度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于驾驭资本的实践之中,不仅能开创利用资本的新境界、打造为民谋福的资本,还可以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本质的升华。

## 四、结语

基于马克思对资本隐喻的研究,化蛹、蝶变到吸血鬼让我们从叙事逻辑上把握资本的

出场过程,“魔法师”到“普照的光”让我们认识到资本得以持续在场的合法性逻辑,“掘墓人”到“行刑者”让我们窥见资本消亡退场的历史逻辑。基于对资本无序扩张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环节产生的诸多问题的分析,我们看到了在新时代,资本无序扩张会消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而成为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阻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把握资本在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辩证作用,完善以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为路径,从政治上层建筑与观念上层建筑共进构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对资本运行的约束框架。

驾驭资本逻辑的命题产生于过去式,现在处在进行式,也一定是将来式。这就要求我们从唯物史观展开对资本的考察。如果不能从历史规定性上理解资本,资本就会成为超历史的、永恒的存在,资本主义所内含的剥削、异化也会变成自然的法则。马克思隐喻中资本幻化的角色在新时代背景的舞台上必然以新的身份、新的方式粉墨登场。因此,实现对资本逻辑的驾驭就一定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全面把握当代资本运行的新机制、新特点,积极探索新的应对思路,贯彻新的方法举措。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曲折之路和眼下频繁爆发的危机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我们要以此为借鉴,充分吸收过往的经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扬弃”资本作为消灭资本的前奏,以驾驭资本逻辑铺垫超越资本逻辑的道路。眼下,中国共产党驾驭资本的百年历程开辟了一条彰显“中国智慧”的治资之路,沿着这条道路,我们不仅创造了中国

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同时让全世界看到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优势,给未实现现代化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N]. 人民日报,2022-05-01(1).
- [2] 习近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J]. 求是,2022(10):4-9.
-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4] 叶险明. 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论[J]. 天津社会科学,2014(3):16-29.
- [5] 邱海平. 关于社会主义利用资本的几个理论问题[J]. 经济学动态,2022(7):3-15.
- [6] 张旭. 正确认识资本的特性与发挥资本要素的积极作用[J]. 当代经济研究,2022(5):5-15.
- [7] 林炎志. 驾驭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J]. 文化纵横,2021(3):28-38.
- [8] 唐爱军. 论中国道路的三元结构[J]. 江海学刊,2020(3):59-63.
- [9] 秦慧源. 驾驭资本逻辑:理论基础、机制保障和实现路径[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39-43.
- [10] 荣兆梓.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范畴及资本作用两面性[J]. 中国经济问题,2023(4):1-11.
- [11] 胡博成,朱忆天. “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逻辑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2022(3):1-8.
- [12] 邢荣.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逻辑”的超越[J]. 理论视野,2023(6):57-63.

- [13] 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1] 大卫·哈维. 资本的限度[M]. 张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
- [22]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24] 解晋. 转移支付、对外开放与劳动力市场整合——分权下的锦标赛竞争[J]. 上海经济研究,2021(3):33-44.
- [2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6] 李克强. 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N]. 经济日报,2017-03-17(1).
- [2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责任编辑:王佳)